



农业大包干责任制取信于民 岳阳地区集体个人一齐上生机勃勃 粮食连续两年季季增产，多种经营迅速发展，社员逐渐富裕起来

本报讯 湖南岳阳地区不断清除“左”的影响，努力搞活经济，今年农业生产出现“集体个人一齐上”的生动局面。

一、群众对责任制更加相信，对生产更加用心。去年岳阳地区99.3%的生产队推行了大包干责任制。今年初，他们组织地、县、社队23,000多名干部，用两个月的时间宣传中央文件精神，签订经济合同，较好地解决了干部群众思想上怕变，工作上混乱的问题，使群众吃了定心丸。汨罗县玉池公社安山大队社员袁有军写了一副对联：“去年动动手摇铃心吊胆吃了饱饭，今年稳稳当当放手干定有余粮。”横批是：“取信于民”。今年，社员在田里下长效肥的多了，添置中小农具的多了，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多了，承包多年生经济作物的多了。

上，又增产1.5亿斤，总产首次突破20亿斤，单产达到了700斤。

二、多种经营项目多，产量高，效益好。岳阳地区棉、油、茶、蔗、苇、猪、鱼等七个年产值在1,000万元以上的大宗项目，项项都有新的发展，农村加工业、手工业和社员家庭副业也发展较快。

四、专业户、重点户不断涌现，开创了农业“三高”新局面。岳阳地区今年新发展专业户、重点户8,46万户，比年初增加了3.1万户。这些户一般只种了口粮田，以主要精力从事某项多种生产。他们的劳动生产率高，商品率高，经济效益高。平江县永安大队中队社员李碧清，全家6口人，2.5个劳力，包责任田9亩，养鸭310只，养猪18头，年初他分别与肉食社、粮站签订了交售“一吨肉、两吨蛋、三吨粮”三个合同，到7月底已交母猪1,260斤，鲜蛋2,400斤，粮食4,000斤，全年平均收入可达1,210元。华容县东山镇公德才大队第五生产队共15户，70人，今年早稻一季产粮19万斤，比去年增产3万斤，预计全年粮食总产可达36万斤，比去年增产7万斤。全队今年可交售粮食24万斤，每户平均1.6万斤，人平3,290斤。生产发展，生活改善。全队有9户盖了新楼房，有9户备足了买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机的钱，正在选购名牌产品。最近，有5人写了入党申请书，5个青年申请入团。

叶委员长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大得人心 一年来在台湾岛和海内外影响与日俱增

台湾各阶层同胞强烈要求和谈、统一、与亲人团聚的声浪，有力地冲击着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堤防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叶剑英委员长去年国庆节前夕提出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一年来在台湾岛和海内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与日俱增。

尽管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的声音还处于被隔绝的状态，他们还是知道了“九条”的内容，并且广为传播。台湾各阶层同胞强烈要求和谈、统一、与亲人团聚的声浪，正有力地冲击着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堤防。

一年来，从大陆、到海外的台湾同胞的谈论中，从无数来自台湾的家书中，从台湾和海外一些华人报刊的报道中，都透露出台湾同胞对“九条”的赞赏和支持。许多台湾同胞认为，九条方针政策是宽厚的、具体的、照顾到了台湾各方面的利益，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具有诚意。有的说，“听了中共宣布的这九条，就象吃了一颗定心丸。”

散居在台湾各地的大陆籍老人、经常和老乡聚在一起，互相叮咛要保重身体，以便在有生之年回故乡同亲人团聚。他们的后代和从没有到过大陆的台湾籍同胞，都渴望了解祖国大陆的真实情况。收听大陆广播的人越来越多。今年，海外拍摄的介绍大陆锦绣河山及人民生活的电影电视，曾一度在台湾放映，在台湾同胞当中引起强烈的兴趣。许多人看了《万里长城》等影片后，纷纷要求重播，台湾当局随即下令停止播放。

一年来，台湾青年一代的民族感情也明显增强，他们为祖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和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而自豪，为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为中国女排和其他体育健儿在国际比赛中名列前茅而自豪。有个中学生在以《水》为题的作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我家在台北淡水，故乡有水，母校也有水……大陆上有白山黑水，有名胜胜水，台湾和大陆只隔一水，黄帝子孙血浓于水。”

“九条”发表以后，台湾知识界尤其活跃。他们冲破禁忌，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探索如何实现祖国统一，提出了种种具体的建议。一家杂志去年11月以《中国如何统一》为题举办有奖征文活动，海内外对此“回响空前热烈”，这家杂志编辑部到今年5月评选揭晓时共收到400多篇文章。这家杂志说，这些文章给人的直接感受是：“民族感情，跃然纸上”，其中被人选的20篇，“没有一篇反对和谈、接触”。

（下转第四版）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日本六团体联合访华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出席第三十七届联合国大会

黄华离开北京前往纽约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中国出席第三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团长、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到机场送行。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凌青，代表梁宇藩、米国钧、谢自美以及副代表黄嘉华、朱贵玉、张宗安、杨虎山、孙一先等已在纽约。

赵紫阳会见日本六团体联合访华代表团

赞扬日本朋友为发展中日友好作出重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会见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日本六团体联合访华代表团。

代表团由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中经济协会和日中协会的代表组成。他们是专程前来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会见时，赵紫阳总理同代表团团长井上清、顾问冈崎嘉平太等日本朋友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赵紫阳对日本朋友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在中日两国人民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之际，我们想到许多日本朋友在艰苦的年代和近十年来为促进中日友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有的朋友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中日友好已深入人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同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长期努力是分不开的。日本朋友为发展中日友好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们将载入史册，并激励两国人民为推动中日友好事业不断发展而努力。

井上靖团长谈到了日中两国人民之间两千年来友好交往的历史。他说，日中邦交正常化十周年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我们两国人民坚持互相友好，将对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外交部顾问符浩，贸促会主任王耀庭，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瀨木博基等会见时在座。

我国第一条复线电气化铁路 石太铁路全线通车

年运输能力比使用蒸汽机车成倍提高

本报讯 记者王艾生报道：9月28年，年运输能力比使用蒸汽机车成倍提高。这条电气化铁路的全部设备，都是我国自己制造的。机车全部用国产“韶山—1型”电力机车。

制定宪法时，就研究了世界各国的宪法。现在情况变了，我们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互相往来。研究法学必须吸收古今中外的有益的经验。不能以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法学上没什么东西。我国古代法有丰富的经验，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法很多，不过封建的经验，要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吸收有用的精华。研究中国过去的、外国的法干什么？是跟着它跑？不是。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服务。对社会主义有益的，就吸收，对糟粕、毒素要抛弃，要批判。这和实用主义不同，我们有四项基本原则，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标准。法学要研究古今中外的法律，不管进步的、中国的、反动的，不管是奴隶主的、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要研究，取其有用的精华，去其糟粕和毒素。

四、法学是什么？是上层建筑。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又要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社会有了发展，经济基础发展了，法要随着发展。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法也要随着变化发展。但法学又有自己独立的体系，自己的逻辑。立法要来自实际出发，但也要有自己法的体系，前后、左右不能自相矛盾。不能灵机一动想搞什么法就草率地搞什么法。

这两者好像是两个东西。如果两者不一致怎么办？对此，法学界的思想恐怕也并不完全一致。一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法律是法律，还是子女？实际是母亲。实际产生法律。法律、母亲是儿子。法要有自己的独立的体系，有自己的逻辑，但要从社会主义实际出发，受社会实践检验。如果法与实际和社会发展需要不适应了，就要研究修改。宪法修改草案就是从实际来的，是我国三十几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总结，也吸收了外国的经验，但又有自己的体系和逻辑，不能互相矛盾。是否这样认识？请同志们考虑。

今天，我在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上抛一块砖，希望引出你们的玉来。（新华社发）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在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彭真

我来参加会，是为了祝贺中国法学会的成立。杨老（杨秀峰同志）要我讲话，讲什么？

一、希望法学会按杨老讲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做出贡献。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起来没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大家认识都一致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不是只是一种学说，只是“百家争鸣”中一家的主张？不是。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共中央提出的，但它不是凭空的设想，而是我国二十世纪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国历史自己总结出来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实践检验过的真理。远的不说，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至少发生了四件翻天覆地的重大事件。第一件，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成果被反动势力篡夺了。第二件，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件事是什么人领导完成的？是资产阶级？开明士绅？还是其他什么英雄？都不是。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工人阶级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第三件，废除了剥削制度。建国初期，没收了官僚资本，解决了资本主义中的80%。经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后来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废除了几千年人吃人的剥削制度。第四件，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解放前，我国是农业国，是供应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国家原料的产地和资本主义商品的销售市场。当时，一辆汽车也不能造，石油只有20多万吨、煤只有四千几百万吨，不能制造精密、大型机械，这就是当时的工业基础。三十几年来，不管我们经过多少曲折，现在不但可以制造汽车、飞机，而且生产了导弹、原子弹。现在年产石油1亿吨、煤6亿吨，有品种比较齐全的280多万台机床，与世界各国比，不算少。这说明了什么呢？三十几年来我们艰苦奋斗的结果，有了可以自己装备自己的坚实的工业基础。这几件大事，不是那个学派的什么主张，而是铁的事实。事实最雄辩，最有说服力。历史实践证明，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向哪里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道路就会是光明的、坚定的，越走越宽广，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一定克服，就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杨老说，要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出贡献。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当然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当然不是搞资本主义法制，更不是法家那一套。法家、儒家都是封建的。我们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什么是社会主义？废除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实行计划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废除剥削制度是根本的标志。当然，我国还有经济犯罪，还有变相剥削，走私贩私、贪污受贿和各种经济犯罪实质上都是变相剥削，但在我国剥削制度已经废除了。走私

贩私、贪污受贿等，在我们的国家是犯罪行为，不是经济制度。

法学会的工作主要的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出贡献。

二、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社会科学和法学不联系实际干什么？个人爱好，只要对人民无害，研究什么都可以。但是，法学会的研究工作应当联系实际。什么是联系实际？就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找出中国自己社会的发展规律。同时，又反过来用于实际。

现在的研究工作是不是都联系实际呢？不见得。有的从希腊、罗马出发，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的观点出发，从书本出发，从概念出发。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统治的意识形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客观实际只有一个。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实际出发，用实践检验，就容易辨别个人的想法对不对。这样，就有了客观的标准，大家从实际出发，大家用社会实践检验，法学界的思想就容易统一。

三、要吸收古今中外的有益的经验教训，这一点很重要。中国是大国，夜郎不要自大，大国自大也不好。建国初期，所有帝国主义都对我国封锁，怎么办？关起门来打扫屋子，把三大敌人的残余打扫干净。就是在那个时期，我们也研究世界各国的经验。1954年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提到战略的高度，确定了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的理论和观点和行动方针。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党中央多次郑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最重要的几次来说，首先是，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讲话明确地提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不限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把这个同题作为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尖锐地指出：没有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进一步确认“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并且把党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概括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说，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统一，构成了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纲领。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这个全面建设纲领，现在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肯定，在十二大的文件中得到了系统的展开。

党中央这样地提出问题，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发的，是从我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出发的。从现实和历史上升为理论，十二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论述，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深刻思索。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特征的全面概括，关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概念的说明，关于两种文明的辩证关系的说明，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观点，都有新的见解。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些论述，从理论高度和政治高度来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战略中的意义和作用，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些概念，特别是文明这个概念，在中外文献和日常生活中是广泛使用的。但是，人们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赋予它们的含义却多样而不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这个概念也是常用的，含义也未大确定。既然文献已经表明，这些概念应当成为对社会生活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些基本概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概念应当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那么，对这些概念作出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就是我们理论研究的必须完成的工作。十二大的报告为这种解释提供了基础。

十二大的报告是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些概念的。这个角度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的着眼点。报告引用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两段话作为立论的由来。这两段话解释文明这个概念，应当说，文明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与人类社会俱来。因为人类正是从改造世界的劳动中开始自己的历史的。

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报告中的这个解释，展现了精神文明的广阔领域。所谓人们的客观世界的改造，不能理解为只是思想意识的改造，还应当有人们的认识及其能力的发展和改造，人们的情操、意志、感性的发展和改造。精神文明既包括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两大方面（或者说，以这两大方面为基本内容的许多方面），又包括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从个人的文化修养、科学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审美修养、精神境界，到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和习俗风尚，一句话，包括人类整个精神世界的发展和改造。

无论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都是物质和精神、客观和主观相互作用的结果。物质生产的工具，是人类智力和精神的物化，体现了精神的内容。精神生产的产品，需要物质的外壳，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教育、图书馆、博物馆、文物等各项文化事业，都需要物质的条件和物质的设施。

至于社会的改造，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是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所推进和促成，另一方面又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决定它们的性质和方向。社会的进步，最终要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作尺度来衡量。

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质由社会制度、由生产方式来决定，这是遵循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必然达到的结论。马克思说过：“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生活由这两者决定，因而来看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文明的发展，可以说，随着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更替，相继出现了原始公社制的文明、奴隶制的文明、封建制的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是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相适应的文明。社会主义文明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继承和吸取人类文明的全部有价值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使之作为劳动人民所享有，为满足和提高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服务，在这个基础上去发展和创造人类最高的、新

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红旗》杂志评论员

型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我们说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从而且仅是从物质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全民所享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意义上说的，并不是说物质文明的内容本身有“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之不同。我们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精神文明的总体的性质来说的。具体分析起来，精神文明的一些方面从观念上反映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它的思想内容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精神文明的另一方面，例如自然科学知识，一般文化知识，则和物质文明一样，反映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共同成果，说它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从它为人民所享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意义上说的，并不是说它的内容本身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之不同。这是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必须交代明白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特征，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过去在讲到社会主义特征的时候，人们往往强调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人们还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也是它的特征。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还不足以完全包括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这里提出的是怎样来概括社会主义特征才是全面的概括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有根据呢？是有根据的。1886年有人请求恩格斯为他们准备编印的文集《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简短文章。恩格斯回答说：“我们对未来事实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这些特征的经济方面，我在自己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曾试图加以叙述和解释……即使这个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非经济的社会问题都根本未触及的不全面的概述，我也无法写得更加简短。”（着重号是引用者加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社会主义特征所作的叙述，转载于他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入门的小册子，限于分析社会主义特征的经济方面，着重指出的是：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取代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将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生产，取代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特征的其他方面没有论及。这不仅可以作为著作的篇幅不允许，而且因为当时的需要是首先突出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即经济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敌们否认和忽视的正是经济的决定作用这个主要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作为从分析客观经济发展过程出发得出的确切结论，而同那些离开客观经济发展过程，单纯从伦理观念出发空想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所以，恩格斯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自己也指出，限于经济方面的叙述，还不是对社会主义特征全面的概述。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发挥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要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的思想，这是论到了现实的政治行动；又提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劳动者从社会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部分消费资料的思想，即后来人们称之为按劳分配的思想，以区别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的按需分配，这是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特征的经济方面。这些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特征的极重要的论述。但是加上这些，仍然没有构成对社会主义特征的全面概括。当时没有这样的需要，马克思也没有自己规定这样的任务。

关于未来社会的精神文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集中论述。当然，社会主义要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要使教育、科学、艺术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这类原则性的提示，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面临着组织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现实任务，这时的情况把全面概括社会主义特征的问题提到了革命领导者的面前。列宁在论述社会主义特征的时候，除了反复阐明上述各点以外，特别强调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他曾经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个公式，并且说过：“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巨大勇气就那种认为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机械观点，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清醒头脑，强调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国家，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它应当具有的物质技术基础。列宁强调社会主义的这个特征，是完全正确的，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当然，这个特征还不是社会主义已经具备的，而是它应当具备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

但是，当人们强调列宁这方面思想的时候，还必须注意，列宁从来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任务。正是列宁，反复阐明了共产主义教育，

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纪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重要意义。他说：“树立新的劳动纪律，建立新形式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创立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新方式和新方法，——这需要许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工作。”“这是最能收效最高尚不过的工作。”他说：“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正是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之后，要实现文化变革、文化革命，即普遍提高文化知识和发展物质生产，才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指出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正是列宁，提出了我们现在称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方面的任务，虽然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集中的概念。

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依靠正确的思想指导、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献身精神而取得胜利的传统，根据我们党和我们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独创的丰富经验，非常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发扬革命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也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深刻的思想。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等等。

现在在我们党中央继承了列宁、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正确思想，又总结了我们在这方面犯错误的教训。这主要是在“左”倾错误下，我们过去未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长期轻视教育科学文化，思想政治工作由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而弄得是非混淆、范围窄狭、方法非常简单粗暴，在经济建设中还犯过夸大主观意志和革命精神的作用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忽视人民群众物质利益的错误。近几年来我们坚决纠正这些“左”倾错误，同时又研究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在这方面遇到的新问题和取得的新经验，提出了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从而确立了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形成了我们全面概括社会主义特征的理论。这是从社会主义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新结论，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建设中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

有这样一种观点：精神文明决定于物质文明，物质文明不高，就谈不上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发展了，精神文明自然就发展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这种决定作用，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的，是就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来说的，不应当把它简单化。分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不可以离开社会制度。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来看，物质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的进步，社会制度的进步，三者是相互促进、平衡发展的。但是，在各个具体历史阶段上，在各个不同的国度里，这三方面的发展又往往是不平衡的。由于社会制度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由于精神文明包括广阔的领域，精神文明的各个不同部分的发展水平同物质文明发展水平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状况，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景象。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些国家物质文明十分发达，而另一些国家由于长期遭受别国的发达国家的侵略、压迫和掠夺，物质文明十分落后；在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虽然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很进步，但仍然是劳动者受剥削，许多人处于贫困状态，同时也存在着精神的野蛮、精神的堕落、精神的空虚。这不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最明显的丑恶现象吗？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得到物质文明发展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但是，不平衡仍然是存在的，只是性质和情况同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了根本的区别。世界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是首先在物质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建立。这个事实早已驳倒了那种对历史唯物论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决定作用的简单化理解。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使物质文明的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同享有，使物质文明的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和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并且终将保证我国的物质文明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经过广大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一定能够改变长期历史形成的不发达状况，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但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却不一定要等到物质文明已经高度发展以后才能进行，就好像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首先在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中发生一样。报告中说得对：“如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有了发达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成功（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就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同部分来说，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物质手段和技术手段，它们的规模、数量、技术水平在较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但是，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社会的精神面貌和精神生产、精神产品的思想内容，社会关系和社会风尚，却可以由于社会主义

制度的建立，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觉悟和奋斗，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同时，达到很高尚的境地。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共产主义理想在全社会广大群众中的普及和提高，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主义的团结互助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新的伦理道德观念、新的自然界的纪律和新的社会习俗风尚的形成，这些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最重要、最现实的表现。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人民群众高度的政治思想觉悟，有力地促进着物质文明的发展，终将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明，那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将得到全面的体现。

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会由于物质文明发展提供的基础而自然发展，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凭借这个基础，自觉地、坚持不懈地进行艰巨的工作，才能发展。同时，物质文明的建设还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它提供精神的动力，并且保证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我们说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是说我们的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制度，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由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保证这种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之一。

报告中说：“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的任务，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这是一段值得我們反复深思的极重要的论述。

只有这样来理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才能把精神文明的建设提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 and 战略高度，才能认识到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的重大问题，才能把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作全党党的任务，当作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当作每一个干部和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参与的的光荣任务。在精神文明建设岗位上的每一个工作者，都应当意识到自己的庄严职责。他们的工作都应当服务于，而不应脱离离开，更不应当有损于对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他们还要以自己的工作去帮助和促进物质文明的建设。在物质文明建设岗位上的每一个工作者，都应当意识到自己同时担负着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他们不仅要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而且要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同时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决不容许搞政策、措施、工作妨碍以至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他们还要从各方面关心和支支持文化建设的发。这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就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动力；物质文明的建设，逐步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逐步保证人们精神生活的自由的、全面的、充分的发展。“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关系

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这两方面“是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的”。在理论和实践上，我们都应当强调这两方面的统一，而不应用一个方面去否定或贬低另一个方面。

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的任务由革命转向建设以后，它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要求我们“坚决扫除长期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轻视知识分子是完全错误的观念”。这次报告又指出，这种观念“过去由于‘左’倾思想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在我们党内相当普遍、相当长期地存在着”，“严重地妨碍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这就使提高对文化建设的认识和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当前具有特殊的紧迫性。因此，十二大报告特别把发展教育和科学列为经济发展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决心努力逐步改变文化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重申在1990年以前在全国基本实现初等教育普及及这一应早已完成的任务，要求各项文化事业都达到和实现最近五年来十年的奋斗目标。

现在我们党要求广大干部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全体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这些都是强调思想觉悟和知识文化统一。文化科学知识的提高同思想觉悟的提高是有一定联系的。特别是从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科学理论，使人们的觉悟、理解、信念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方面来说，以及从掌握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专业技能，使人们的思想觉悟落实到建设本领上这方面来说，更是如此。当然，我们不能说文化程度高必定思想觉悟高，我们的革命队伍中过去有许多先烈文化程度不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和牺牲精神永远是他们的楷模，永远引导我们向前。但是，他们的觉悟是在党和军队的革命教育下提高的，就是说，是同一定的革命文化的影响相联系的。即使在当时，革命队伍也要求和帮助他们的成员努力学习文化。如果这些先烈活到今天，他们一定会适应时代的需要，响应党的号召，更努力去提高自己的文化，决不会以文化不高为满足，更不会用文化不高来自豪。

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联系我国和世界的现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水平，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是思想建设的根本。一切文化建设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发展。文艺和科学要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求得繁荣和进步。（下转第四版）

河南山区经济有发展

具体问题的相应措施，使方针落到实处。有了正确的山区生产建设方针，还得有帮助山区人民解决

本报讯 记者段心强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制订了山区生产以林牧为主的方针，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帮助山区农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正确的方针落到实处，促进了山区经济的发展。

解决口粮问题，保证退耕还林还牧。山区由于长期搞“以粮为纲”，征购过多，统销粮不足，农民口粮紧张，因而多年毁粮开荒，使山区迟迟不能退耕还林还牧。针对这种情况，1980年省里拿出1,500万元支持多种经营。陕县用支援山区的200多万元建设了烟叶烘烤厂和奶粉加工厂，使全县的5万烟叶都能进行烘烤，避免了腐烂；鲜奶全部可以加工，消除了用奶喂猪的现象，使奶山羊很快由3,000头增加到7,000头。

解决交通问题，保证物资能进能出。很多深山区因为道路不通，工业品运不进去，土特产品运不出来。省里为了发展山区的交通事业，每年拿出600万元搞公路建设。灵宝县五亩公社的深山区原来由于没有公路，苹果、柿子烂掉，核桃积压，农民吃粮困难。1980年以来，他们修公路31条，每个大队都通了汽车，使土特产品能运出山销售，增加了农民收入，去年平均每人增加收入50元；粮食和工业品能够及时进山，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解决水质问题，保证农民身体健康。河南山区大部分缺水，有些地方水质很差，饮后易得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省里每年拨出2,000万元，帮助山区打井，搞抽水站，使群众饮上卫生的水。灵宝县寺河公社属高寒山区，水质不好，农民易得大骨节病和克山病，他们就千方百计到平原地带安家，只在春天上山干活，秋天收完下山。因此有“等河山，人如燕，春来秋去冬不见”的说法，影响了生产的发展。近几年，省里投资25万元，建成16处抽水站，使农民喝上了符合卫生标准的水，从而消灭了大骨节和克山病，许多农民在山上安了家，发展了生产，穷山沟开始富起来了。

经过几年的调整，目前河南山区经济已经有了发展。1981年同1978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22%，人均收入由57.5元增加到125.2元。

日夜坚守岗位积极做好灾害性天气预报

气象部门为抗灾救灾工作做出贡献

本报讯 今年我国一些地方出现灾害性天气，广大气象工作者日夜坚守岗位，严密监视天气的变化，对暴雨、大风、低温等多种灾害性天气，作出了较为准确的预报，为进行抗灾救灾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

人春以来，青海、甘肃、新疆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多次出现暴雪和大风，个别地区积雪一米以上，有的地方风力达十二级。中央气象台和青海、甘肃、新疆的气象台、站，分别提前二至三天作出了准确的预报。上述地区的农牧业有关单位及交通部门，根据预报提前作好抗灾准备。灾情出现后，青海省气象台又及时预报

龙江县农民存款多

天气形势，推动了抗灾救灾工作。

人夏以后，广东、广西、福建等十多个省、区局部地区连降暴雨和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和上述各省的气象台、站都做到了提前1—4天发出预报，为各级领导部门提供了防汛抗洪斗争的依据。

最近几年，各级气象部门在搞好灾害性天气预报

报服务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了对气候资源的调查研究

人夏以后，广东、广西、福建等十多个省、区局部地区连降暴雨和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和上述各省的气象台、站都做到了提前1—4天发出预报，为各级领导部门提供了防汛抗洪斗争的依据。

最近几年，各级气象部门在搞好灾害性天气预报

“种田师傅”上门的启示

蒋才华

前些时候，江苏省宜兴县针对建立责任制后一部分农民不懂农业知识的情况，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农业科技户与科技贫困户挂钩；在每周两期的《宜兴报》上开辟“农业科技”专栏；办农技简报等等。采取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迫切需要，不能及时地把农业科技送到千家万户。

今年以来，宜兴县委、县人民政府与有关部门商定，在县里的有线广播节目中，把原来每天一次用普通话广播的十分钟农业科技节目，改为早、中、晚连播三次，用宜兴方

言播送，并注意从内容和形式上改进，提高质量。这一改，农民很留意，都说，这样搞，农技知识每天连播三次，等于“种田师傅”上门，只要天天听广播，科学种田的办法就多了。

“种田师傅”上门，对县农业部门、广播部门来说，不过是工作安排上并不太大的改进，但实行责任制后的农民，却感到得益非浅。这一改，农民对农技节目可以从原来的难听懂（或听不懂），变成听得懂；从容易漏（听）到漏不了（漏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还可以听）。这就增强了农民学科技的兴趣，又

沈阳市委学习贯彻十二大文件精神

大力发展“两户”开创商品生产新局面

强调现行政策稳定不变，对专业户搞协作、搞联合要给予支持，但不能用行政手段去“捏合”，应坚持自愿互利原则。

据新华社沈阳电 中共沈阳市委、市人民政府学习贯彻十二大精神，决心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专业户、重点户（简称“两户”）的领导，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创一个新局面。

目前，沈阳市郊区农村，从事家庭饲养业的“两户”已有12.16万多户，占全市总农户的四分之一。今年到6月末，占全市总农户14.6%的养猪“两户”，向国家交售了占全市总收购量46%的商品猪；占全市总农户8.6%的养鸡“两户”，向国家交售了占全市总收购量51.5%的商品蛋。现在在沈阳郊区农村，一年养百头猪、千只鸡，交售万斤肉、万斤蛋，收入超万元的专业户，越来越多了。

在沈阳市委、市人民政府最近召开的农

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会议上，以十二大精神为指导，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对发展“两户”重要意义的认识，继续清除“左”的影响，解除群众怕政策变的疑虑。市委郑重宣布：现行的对畜禽产品的收购政策、派购政策、统购政策以及奖售政策，都保持稳定不变。各县、区和各社、队自行制订的一些扶持“两户”的措施，也应坚持实行，社员自留地、饲料地，都要按规定下放给个人耕种，长期归社员家庭使用。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数量，有条件达到但现在尚未达到占耕地总面积15%的，可增加到15%。土地较多的地方，还可以多划给社员一些土地，专作饲料地，用于扶持“两户”发展畜牧业生产。专业户在完成派购和合同



欣欣向荣的农村

辽宁省盖县陈屯公社和平大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大队91.3%的农户在庭院栽种了葡萄，仅这一项，每年人均收入大为增加，社员生活普遍得到改善。

于广海摄（新华社稿）

充分发挥了有线广播为群众、为生产服务的作用。真是上面提“举手之劳”，下面收“盈屋之利”。

县以下各级领导机关以及各部门各单位，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农民服务的。过去，为发展农业生产 and 搞好农村工作，大家出了气力，工作是有成效的。但是否还有潜力可挖，还可把工作做得更好呢？这就需要为“为人民服务”这个前提下，从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建设“两个文明”出发，到多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要求和意见，注意从变化着的情况中发现新问题，千方百计改进工作和服务方法。



乡邮路上说“稀奇”

鲁道生 左榕平 吉太耘

“你父亲有钱用，退给你，请查收。李代办。”这还不算，去年年底，老胡听人说宁夏皮货好，特意给大女儿寄去110元，让她给他买皮货。这二三年，老胡家盖了瓦房，买了3块手表，3辆自行车。

李国汉接着说：二十多年来，我总是把城里的汇款单一张张送下乡，现在我这个乡邮员却增加了一项新业务：帮助社员往城里寄钞票。去年，经我手送的有1,000多块，今年上半年又汇出800多。

李国汉扳着指头说：我跑在这条路上，过去都是草房，现在盖瓦房不算稀奇，不少人家楼房也盖起来了；电视机天线从奇

李国汉最后说，说稀奇起来了；电视机天线从奇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民拿了许多好主意。

电视周报，今年社员的又冒到40份；村里的理发店也同城里一样挂起大吊扇；不少社员家沙发、藤椅也买来了；以往社员们不大沾边的好烟好酒，现在也往家里搬；年青人走亲戚、进城买东西，也穿呢料、蹬皮鞋了；老年人进城都喜欢搭公共汽车，不象过去为了省钱老是甩腿；社员私人办的代销店、小吃店也有好几家，社员们都说现在有钱买东西方便，许多人家早上也买早点吃了；过去日报刊，除了公家就是老师、医生，如今社员日报刊的越来越多……

李国汉最后说，说稀奇起来了；电视机天线从奇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民拿了许多好主意。

6口人，4个孩子都未成年。一户饲养30多头大牲畜，还有猪养鸡兔，加起来有100多张嘴，铡草、配料、起圈、垫土，牛生病马下驹，全家还承包12亩地，处处都得经管到。李林槐的妻子李二妮，是老李的好帮手，喂牲畜，清圈棚，还有做衣、烧饭等家务，都由她承担起来。畜无夜草不肥。李二妮每夜总是悉心经心地给牲畜添草料三四次。她说，这些年，就睡过一夜安安稳稳。农村儿女当会家，家里的孩子们，也都负担一定的养育任务。16岁的女儿，放学后帮助家里做



图为记者在路上遇到的李林槐。

本报记者 高 粮 安子贞



八月里，我们来到山西采访五台六月会（农历）。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以牲畜交易为主的庙会。会址在五台山脚下的台怀镇。位于黛螺顶下、清水河畔的交易市场，骡马驴牛数不胜数，买卖双方衣襟下用指语议价，生意兴隆，热闹非凡，呈现出畜牧业大发展、农村经济空前活跃的一派繁荣景象。这次牲畜交易的一个特点是，有一批养畜专业户前来赶会。这些专业户，养畜多，商品率高，单位成交量大，有买有卖，给交易会增添了生气，引起众多农牧民的关注。据市场管理负责人介绍：五台县石咀公社后坪大队养畜专业户李林槐，这次卖出牲畜16头，买进母畜一头，是成交最多的一户，成为这次庙会上令人感兴趣的新闻。我们想访问他，不料，他已经做罢生意回家了。

后坪大队距台怀镇约30里路，在我们去李林槐家的路上，正当汽车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谷颠簸前进的时候，只见一个中年农民，身背油纸大雨伞，腰挎粗线布袋，手牵两头肥猪的大马，紧跟着四头黄牛，兴勃勃地迎面而来。石咀公社党委书记戎戎同志看见后，忙叫司机停车，喊住来人，向我们介绍说：他就是李林槐。

李林槐把牲畜托靠给邻居人照顾，领我们来到他的家里。我们说明来意以后，他谦虚地说：“我没有什么本事，全靠党的领导好，政策好。各级领导这样看得起我，我就应该带头把五台山区的畜牧业发展起来。”这简单、质朴的话语，反映了一个普通农民热爱党，衷心拥护党的政策的决心。

李林槐，今年四十六岁。以前，他父亲在队里当饲养员，他从小就熟悉牲畜脾性，格外喜爱牲畜。后来，他自己也在生产队当了八年饲养员。李林槐说，

五台山古庙会上的新闻

——访一次出售十六头牲畜的专业户李林槐

本报记者 高 粮 安子贞

自己喜爱那件事，就处处留心，想办法把那件事办好。长期饲养的实践，使他不仅摸索出一套科学饲养方法，还掌握了初步的兽医知识。他为集体饲养的牲畜，疾病少，上膘快，受到社员的赞扬。在十年动乱期间，“左”的思想泛滥，对农民卡得很紧，这不许做，那不准干。但是，农民有自己的想法，能多养些牲畜，为社会增加财富，为个人增加收入，这有什么不好呢？在这种思想支配下，1973年夏天，李林槐从五台六月会上用70元钱买回一头毛驴，在家饲养了一年，毛驴个大了，膘肥了，第二年夏天卖了125元。不料想，这件事闹下大祸，挨批判，交罚款，折腾了好一阵子。从此，李林槐再也不敢想养牲畜的事了。

1979年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传到了这个小小的山村，教育了基层干部，唤起了社员勤劳致富的积极性。人们议论开了，李林槐为养一头毛驴，又挨批，又受罚，这不对吗？社队干部知错就改。大队党支部书记罗命双找到李林槐，动员他写申诉，请求平反。李林槐说，文化水平低，写不来。罗命双就帮他写。后坪大队距离五台县城一百多里，进一趟城不容易。公社党委书记戎瑞瑞主动代劳，把申诉信送到县里。不久，县工商管理局退回了罚款，并向李林槐道了歉。县、社、队的干部都鼓励他继续养好牲畜，为发展农牧业出力。李林槐说，党给我落实了政策，“罚”变成了“敬”，“敬”落肚，心里暖了，就得把劲头使出来。

这时，队里的牲口已经包到各户喂养，李林槐要发展牲畜从哪里着手呢？他听传达，看报纸，知道党的政策允许社员个人饲养大牲畜，1979年他先后买了一头弱畜，两头母畜，打下了专业饲养的基础。1980年他从供销社和信用社贷款450元，加上自家的积蓄，买回7头牛，一匹母马，当年生下一头骡驹。在这年的六月会上，出售牲口4头，收入1,800多元，归还贷款，剩余1,400元，又买下了5头母牛。这样滚来滚去，他饲养的牲畜年年增，收入步步高，受到了县、社的表扬，参加了省里的劳模会。人民政府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三年来，李林槐累计贷款8,000多元，今年饲养的大牲畜发展到33头。这次交易会上，他卖出牲畜16头，得款6,700多元，计划再出售两头，归还贷款。这样，剩下的15头，就是赚的了。他介绍这些情况时，非常兴奋地说，生产搞好了，全家的生活也改善了。他带我们参观新盖起的住房，正在修建中的牛棚、马架；看里外屋里摆着的缝纫机、铁边机；当时，放在柜上的一台收音机正在播放晋剧，他象受到启发似的，打开柜子，又拎出了一台，笑着说，这是新买的，还没有用，等以后村里把电接过来，我还要买电视机呢！

李林槐会饲养，善经营，他买回的是病畜、弱畜、小畜、母畜；不出一年，病的变好了，弱的变壮了，小的变大了，母畜生小畜，少变多了。这几个“变”，是一家人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李林槐家有

丰富多彩的交流与不可动摇的友好

铃木首相应邀在政协礼堂发表演讲



木首相的演讲，感到格外亲切。

刘澜涛说：“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十年来两国政府和人民遵循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与精神，克服困难，排除干扰，不断地发展了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十年友好，在中日二千年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奠定了可贵的基础。”

他指出，在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之际，铃木首相访问中国，并在此发表重要演讲，这对两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铃木首相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发表演讲。他说，在十年前的今天，日中两国结束了长期的不正常状态，揭开了两国关系上的新篇章。日中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为两国人民渴望友好往来、交流欢迎而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在回顾往事的时刻，同时令人深感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日中两国有关人士的艰辛足迹。今天我在这里再一次地向已故毛泽东主席阁下以及这些前人先辈所树立的丰功伟绩，表示崇高的敬意。特别是深受贵国国民敬爱的已故周恩来总理阁下，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不分昼夜费尽心血，这是广大日本国民所了解的。当时，我也身任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总务会长为统一党内意见，尽了绵薄之力。虽然我所作的工作绝不与周总理所尽的辛劳相称，但是我也能够切身感受到周总理所付出的艰辛之苦。正值日中邦交正常化十周年这一值得纪念的时辰，我再次提起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之精神与原则，由此决心要进一步加深两国的关系。

铃木首相回顾了十年间两国友好合作的光辉历程。他说，这十年来，日中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两国政府先后签署了各项实务协定，并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同时通过政府成员会议以及其他各种渠道，经常交换意见、增强相互理解。在经济、文化、学术等领域里也加强了交流，扩大了合作。在这十年里，两国间的贸易总额增长了10倍，由11亿美元增加到104亿美元；人员往来也由9,000人增加到13万人，增长了14倍。由于确立永久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现在我们两国将进入向新的共同目标而飞跃发展的阶段。正如前不久赵紫阳总理阁下在访日时所说的：中日两国的关系得到了“地利、人和”，加之“天时”的有利条件。

铃木首相强调，在当前严峻国际形势下，位于亚洲的日中两国，应有责任首先对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近年来，东亚地区之所以能出现较为平稳的局面，可以说是由于日中两国十分重视与邻近各国之间的关系，同时发展友好关系的结果。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强如前的努力。日中关系所具有的经济与所应承担的作用，并不限于亚洲地区。目前对世界和平蒙受威胁、国际经济所面临的深刻的困难、南北之间所存在的利害冲突等不少问题都需要日中两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日中两国更应该继续维护与发展友好关系，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他说，战后，日本立足于反省过去的基础上，于1946年制定了和平宪法。这一宪法规定：“日本国民愿望恒久的和平……决心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国民的公正与信义，保持自己的安全与生存”。以后我国一贯以和平为我国国策，坚持不成为军事大国的立场。这项国策也是我国国民的共同愿望；即使国际形势面临日趋紧张、动荡的局面，也毫无意何更改。

他说，中国也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尤其贵国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为一体，并以此定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处理目前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我高度评价贵国这一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认为日中两国基于这一原则立场相互携手合作，是解决现在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难题的关键之一。他说，如果就日中友好合作所肩负的使命而言，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微不足道的。日中友好的千年大计，目前刚迈出了前进的第一步。我们应该以创始人的干劲，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

铃木首相说，最近，就我国的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受到贵国的严厉批评。我国一直本着日中联合声明致力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我国一贯遵循的方针。将这联合声明的精神与原则确切适宜地体现到日中关系的所有方面是极为必要的。对于教科书的问题，我也愿意以我国应尽的责任而真诚、认真地加以努力。我确信通过这一问题的解决，势必坚实与巩固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

(下转第六版)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 为庆祝古尔邦节举行招待会

据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今天晚上在民族文化宫举行招待会，庆祝古尔邦节。

中共中央统战部、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国务院宗教局负责人，伊斯兰

教知名人士，以及穆斯林国家驻华使节和在京工作的外国穆斯林专家，共200多人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任凯本在招待会上讲话。他说，中国各族穆斯

林群众正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进一步加强同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力量。张杰强烈谴责了以色列当局侵占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野蛮屠杀巴勒斯坦平民的行径。他表示坚决支持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各国的正义斗争。

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制度在精神文明方面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而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所瞩目。“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动乱，把人们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搞乱了，不仅耽误和破坏了物质文明的建设，尤其破坏了精神文明的建设，损害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使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腐朽思想泛滥起来，后果是极其严重和深远的。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拨乱反正，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情况迅速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清除“文化大革命”在精神方面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需要作长时间的努力。同时，新的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这几年来，我们强调转移工作中心、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按劳分配，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些都是正确的，必要的，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取得了群众的拥护。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的继续存在，由于旧的私有者习惯和外来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袭，由于在转变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

铃木首相离京赴杭州访问

赵紫阳总理到宾馆为日本贵宾送行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铃木善幸和夫人等日本贵宾，由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陪同，今天中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杭州参观访问。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到钓鱼台国宾馆为铃木首相和夫人送行。铃木首相向赵总理表示再次感谢中国政府的周到安排和盛情款待。他希望日中友好合作关系在今后的岁月里在各个领域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赵紫阳总理说，铃木首相这次访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之际，实现两国总理互访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双方要共同努力，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为新

新华社香港9月28日电 香港爱国学生连日举行示威和发表声明，反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坚持十九世纪大英帝国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的言论。学生组织声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收回香港主权是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撒切尔夫人27日下午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些条约是“有效的”，她认为，那些条约不应推翻，而由双方加以“修改”。

当天下午，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的学生代表举着“反对不平等条约”和“侵华条约不容肯定”的横幅标语，在撒切尔夫人

香港一些报纸撰文、爱国学生发表谈话和举行示威

反对撒切尔夫人肯定有关香港的不平等条约

人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场合外举行抗议示威，并递交了抗议信。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的两个学生会还发表联合声明说，“我们不能接受英国首相‘修改’条约的建议，这样等于承认这些条约，无疑令我们的民族尊严再次受挫。”

声明指出：“香港现状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英国不能以‘对香港500万人负责’作为永远统治香港的借口。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是基本原则问题，是维护民族尊严的大是大

非问题。”声明还反驳了英国首相关于“香港是在英国的管辖下繁荣起来”的论点。

在这之前，香港浸会学院学生会时事委员会于26日发表声明说，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都是不平等条约，应予废除”，声明还强调指出，“香港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收回香港主权是中国人民的神圣责任”。

据中间报纸报道，以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为首的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



赵紫阳总理到宾馆为铃木善幸首相送行。

新华社记者摄

的英国立场，显得顽固、甚至是不合时宜的。”

《星岛晚报》9月28日援引香港中文大学政治行政系郑宇硕博士的话说，任何在武力压迫下或政府压力下签订的国际条约，均是不被国际法所承认的。他表示，站在个人的立场来说，他同意这些英国坚持的条约是在不平等基础上签署的。

《快报》9月26日援引律师廖耀璋的话说，中英双方的谈判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如今撒切尔夫人坚持不平等条约原则，并未代表香港民意，因为在香港500万中国人，不分左右，无不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国，也没有人会承认十九世纪列强以武力迫签的不平等条约。

《中报》9月28日刊登署名唐华的文章说，香港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在关键时候，绝大多数人会表现出中国人的风骨。经过一百多年，香港人还是以属于中国人而自豪。

倪志福会见并宴请五个日本工会议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正在我国访问的五个日本工会议代表团。宾主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出席了宴会。他对来自日中工人交流协会、全国电话通信工会、全日本劳动同盟大阪地方同盟、日本煤矿工会和福冈县评议会五个代表团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

叶委员长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大得人心

(上接第一版)许多旅居海外的台湾同胞则更是兴高采烈，议论纷纷。住在纽约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余爱华，最近在《北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我们海外侨胞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家人亲友在台湾或大陆，我们为他们的切身利益着想，都迫切需要祖国和平统一；我们为海外侨胞自己不再受外国的种族歧视痛苦，扬眉吐气着想，也都迫切希望早日和平统一，有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统一安定富强的祖国。”文章说：“现在该是我们海外侨胞开始说话的时候了。”著名台湾作家陈若曦在美国出版的《远东时报》上发表文章，赞成余爱华“三通”和各种交流的建议，她说，“亲人们团聚一项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旅居美国纽约地区的爱国同胞最近还成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其宗旨是“推动海峡两岸相互交流，增进了解，进行和平谈判，促进中国全面统一”。

在西方世界继续持续“滞联”，台湾经济遇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台湾工商界迫切要求同大陆做生意。一位商界人士说，尽快实现通航、通商，“对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都有好处，对台湾的好处更大”。据外国报刊报道，“台湾商人正在巧妙地压台湾当局在通商方面让步”。

随着形势的发展，台湾非国民党人士这一年来对台湾前途和祖国统一的认识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一位著名的非国民党人士发表谈话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台湾的出路离不开大陆这个“母体”。另一位著名的非国民党人士发表文章说，“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循和平方式对等谈判，乃解决当前台湾两岸矛盾必取途径的一环”。

在国民党上层也不都是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立场的。其中有的已是“立法委员”、“国策顾问”，有的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等等，或公开表示“国共和平不失为国家统一之手段”，“不妨一试”；或认为“统一问题已经面临了一个必须突破，也可能突破的关键时刻”，应该“准备中国的问题必须在八十年代内加以解决”。由一位国民党人士主办的《国事评论》月刊今年7月发表一篇文章，指出“一再的拒绝和谈，并不适当，对国家与人民均未必有利，而且有害”。文章认为，“隔和谈而色变”，这显然是一种缺乏斗争的认真思想之流露；“如不改弦易辙，在此弹丸小岛上，将有导致亡国灭种的危险后果”。

廖承志王炳南分别会见香港知名人士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廖承志副委员长今天下午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先生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今天会见并宴请了利铭泽先生和夫人以及同行的英国朋友詹姆斯·司徒拔士爵士、澳大利亚朋友格雷厄姆·詹金斯先生。

作一时未能跟上，现在有一些人“一切向钱看”，公然宣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种种不正之风、邪门歪道乘隙而来，甚至在新中国早已绝迹的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又重新出现。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各项正确的经济政策，保护群众发展生产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同时一定要警惕精神生活中各种腐朽堕落现象的逆流。经过我们党的反复锤炼，经过现实生活的教育，全党 and 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各条战线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扶植正气，打击邪气，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次报告提出，要在今年五年内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的根本好转，并且指出：党的思想建设是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柱；努力实现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在全国人民首先是全国青少年中的普及是争取党内风气根本好转的一项基本措施。我们一定要从党内做起，从干部党员做起，把这些教育工作认真做好，象报告中所要求的那样，“用革命的思想 and 革命的精神振奋起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永葆青春的青春和活力”。(载《红旗》杂志1982年第19期)

(新华社)

